

弃逐逆境中的愤悱与宣泄

——柳宗元贬谪心态探析

王 承 丹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王承丹(1965-), 男, 山东苍山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

[摘 要] 弃逐逆境中的柳宗元, 其情绪的主导方面是“怨怼忿愤”。柳宗元的愤懑, 主要来源于“有劳而见罪”、无辜而被逐, 以及因此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柳宗元愤而启, 悱而发, 用自己的方式宣泄郁愤。他愤山、愤水、愤物, 归根到底却是愤人, 愤“灵”与“帝”。当宣泄的对象归结到“灵”与“帝”的时候, 柳宗元的愤悱便发生了根本变化。

[关键词] 柳宗元; 弃逐逆境; 愤悱; 宣泄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6-0757-06

弃逐逆境中的柳宗元, 内心充塞着难以化解的郁愤情绪, 对此他说:“仕于世, 有劳而见罪, 凡人处是, 鲜有不怨怼忿愤。”贬谪之前, 柳宗元“许国不复为身谋”^[1] (第1221页), 投身于“二王八司马”策动的革新活动。一旦改革失败弃逐炎荒, 恶劣的环境使其肉体与精神备受摧残, 加之亲友叛离与回归无望, 他终至百病交作, 生同于死。柳宗元被一贬再贬, 艰难苦恨相伴终生, 成了“有劳而见罪”的最好注解。他用本来无意而为的诗文作品宣泄内心的愤懑, 却并非一味听任愤怒情绪的流泻, 而是选择了适合自己的方式。当愤悱的对象归结到“灵”与“帝”的时候, 柳宗元的宣泄便只能由张扬恣肆而渐归于低回内敛。愤悱与宣泄, 既使他有了自省的可能, 又为他在弃逐逆境中的自我超越作了铺垫。

—

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九月间, 一场政治革新刚刚启幕, 便遭到了无情的封杀。革新集团的首脑人物“二王”, 其旗下的核心成员“八司马”, 或死于非命, 或被流贬至边远州郡。柳宗元是“八司马”中的翘楚, 所受惩罚自然极为严苛, “初贬刺史, 物议罪之, 故再加贬窜”^[2] (第124页)。“初贬”乃至“再加贬窜”, 这并不复杂的文字组合, 却使当事人的生命运行轨迹发生了注定危难四伏却又无以逆料的改变。“沉埋全死地, 流落半生涯”, 这是平常的友朋间感怀寄赠的诗句^[1] (第1116页), 竟然一语成谶, 成了诗人后半生遭遇的真实描画。若由“贬窜”入手考察, 柳宗元值得关注的似乎不是贬逐炎荒、殒命弃地的不幸, 而是他由此开始的心灵巨变, 即他在逆境中的愤悱、宣泄, 以及由此引发的自省乃至超越自我的心路历程。

贬谪之于柳宗元, 恰如一道分水岭, 横亘在他47年人生旅程之中。如果把柳宗元遭贬前后的变化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 并作一番对比探讨, 那么, 他贬谪后的生存环境与心绪况味更值得人们关注。

就精神层面来看,贬谪后的柳宗元总被一种如影随形的愤懑情绪主宰着。若要寻找原因,就必须从流贬之于被贬者的残酷性中探求。“在古代,流放是最可怖的处罚,因为不只意味着远离家庭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无目的的游荡,而且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人,永远离乡背井,一直与环境冲突,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人们总是把流亡的观念和身为麻风病、社会及道德上的贱民这些可怕的事联想到一块。”^[3](第44页)用这样的话描述柳宗元的弃逐境况,可谓恰如其分。

遭遇贬谪之前的柳宗元,虽然偶有蹶蹶,但仍属人生历程的上升阶段。他“虽少年已自成人”,21岁进士及第,24岁求博学宏词,稍后授集贤殿正字。他自己曾说:“当时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1](第797页)参与革新活动不久,柳宗元渐渐占据要路之津,进而跻身革新集团的核心位置,当时即被誉称为“二王刘柳”。稍后,作为革新派的核心成员,柳宗元与他的同志一起,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事情。革新举措产生了“市里欢呼”、“人情大悦”的直接社会效应,他任事颇多,功莫大焉。

此时的柳宗元,可谓春风得意。放眼未来,展现在他仕途上的前景更是一片光明。但是,命运之神并不垂青这位风口浪尖上的革新志士,却让他猝不及防地坠入了厄运的深渊。随着短寿的永贞革新无可挽回地归于失败,柳宗元转瞬之间成了“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者^[1](第780页)。他最初被贬为邵州刺史,仓皇奔赴谪地的途中,再次被追贬为永州司马。从朝中要员,引人瞩目的改革者,突然成了弃逐荒远的罪囚,心理的适应该是多么困难。到达贬所之后,面对“官外乎常员”、“俟罪非真吏”的全新身分,角色的转换与认定又是多么痛苦的折磨。对柳宗元这样的“许国不复为身谋”的“执著型士人”,更大的打击是回归希望的破灭。对于朝廷“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2](第125页)的苛令,他除了深深的绝望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十年不得量移,让柳宗元在绝望中渐渐变得几近麻木,而在这样的境况中,他不甘沉沦,又逐渐恢复元气,因时因地对自己的人生追求作了一番新的调整与设计。恰在此时,让他爱恨交加的长安却吹来了一股久违的春风,因“执政”“怜其才”而被意想不到地召至京师。可是,还没来得及回味梦想变成现实的快意,却又如一宵春梦转瞬即逝,他和他的同道又一次匆忙离去,“皆以为远州刺史,官虽进而地亦远”^[4](第1643页)。

在偏僻辽远、民生凋敝的弃地永州,以及稍后的柳州,他首先要忍受的就是恶劣环境的折磨。如此荒远落后的环境里,他甚至为了最起码的果腹之需,而祈求上司照抚。与物质匮乏相比较,疾病的折磨让柳宗元更加痛苦不堪。贬谪之后,他便患上痞病、脚气、肿足等疾病,这些病症的同时或交互发作,让他苦痛难耐,以至于在他的诗文作品及写给亲友李建、杨凭等人的信札中,多次说出悲观绝望的话来。柳宗元被放逐远荒,过去的僚友从此渐渐疏远,有些曾经颇有交情的人也落井下石,反目成仇,这也是他难以承受的精神打击。“独被罪辜,废斥伏匿。交游解散,羞与为戚;生平向慕,毁书灭迹。他人有恶,指诱增益;身居下流,为谤藪泽。”^[1](第432页)二者的结合尤难宽解,于是他说:

伏念得罪来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何则?罪谤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

以是兀兀忘行,尤负重忧,残骸余魂,百病交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

消肌骨,非独瘴疠为也。^[1](卷三十《寄许京兆孟容书》)

物质、精神以及其他多方面的侵扰与折磨,让柳宗元发出“神志荒耗,前后遗忘,终不能成章”的悲叹。他甚至绝望地说:“往时读书,自以不至抵滞,今皆顽然无复省录。每读古人一传,数纸已后,则再三伸卷,复观姓氏,旋又废失。假令万一除刑部囚籍,复为士列,亦不堪当世用也!”^[1](第784页)对于柳宗元,“不堪当世用”哪怕仅仅是一种感觉,或者说仅仅是行文的需要,都可视为来自于心灵的巨大创痛。那么,心灵的痛苦又会衍射成什么样的情绪呢?

柳宗元曾说:“仕于世,有劳而见罪,凡人处是,鲜有不怨怵忿愤,列于上,诉于下,此恒状也。”^[1](第617页)“鲜有不怨怵忿愤”,与其说是站在朋友的角度说话,还不如说是假托替朋友说话之名,而写自我心中之悲苦。于是,如此境况中的柳宗元,其情绪的主导倾向是“怨怵忿愤”。征之他的诗文作品,特别是贬谪生涯中的创作,柳宗元的满腔愤懑也时时处处都在喷涌而出。

二

从被逐出长安时起,柳宗元陷入了激愤、怨艾情绪之中。但是,即使在如此情势之下,他还是凭着自我的良性制衡能力,选择了释放怨愤的口子。从具体方式上看,他的宣泄主要采取了愤人和愤物两种类型。实际上,愤人和愤物有着必然的联系,愤物终归还是愤人,只是愤物更迂曲委婉、更易保护自己罢了。先贬邵州,继而追贬为永州司马,一时天怨人怒,这时的柳宗元,真的不知道那个“毕世而怒人臣”^[5](第1479页)的唐宪宗李纯,还有扼杀了革新事业的“仇讎”们,会再一次把他抛到什么样的苦难深渊。他择取非人的物来宣泄郁愤,与其说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还不如说是专制强权淫威之下正直士人无助又无奈的选择。柳宗元终能立德、立言,有所成就于艰难苦恨之危境,也说明他的选择是多么接近乃至达到了一种更高的智性境界。凡此种种,都需要具体深入地分析,而结合柳宗元的相关作品,无疑是进行这种分析时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先看就物泄愤,可举出《瓶赋》和《牛赋》作为这方面的典型作品。其中,《瓶赋》这样写道:

谄诱吉士,喜悦依随。开喙倒腹,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颓然纵傲,与乱为期。

视白成黑,颠倒妍媸。己虽自售,人或以危。败众亡国,流连不归。谁主斯罪?鸱夷之为。

从表面看,作为器物的“鸱夷”,不仅被当作罪愆的承担者,而且也成了遭人愤恨的对象。实际上,“鸱夷”只不过是幌子,它所指向的是能够施行罪戾、承担罪责的人。明于此,柳宗元的郁愤之由来,他要发泄愤怒的对象,便会不言自明。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瓶当作现实世界中具有美德者的代称。进一步说,这个有美德的人就是柳宗元自己。有美德却遭弃逐,又怎能不“怨怼忿愤”呢!

与此同一途辙,《牛赋》也采取了对比、隐喻的方式,由物及人,最后落脚于人。作品先写牛有功德,却不能享受到相应的优待,甚至得不到起码的公平待遇。接着,他又让牛与驴相比:“不如羸驴,服逐弩马。曲意随势,不择处所。不耕不驾,藿菽自与。腾踏康庄,出入轻举。喜则齐鼻,怒则奋蹄。当道长鸣,闻者惊辟。善识门户,终身不惕。”牛驴相较,牛遭遇了太大的不公平,这自然会使人生出无限的愤慨。

体味瓶、牛二赋的特点,虽然都使用了对比与隐曲的手法,但总是给人流于简单失之浅白的感觉。于是,柳宗元选择了更为高明的方式,这便是主客对答,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如《对贺者》:

柳子以罪贬永州,有自京师来者,既见,曰:“余闻子坐事斥逐,余适将唁子。今余视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达矣,余无以唁矣,敢更以为贺。”柳子曰:“子诚以貌乎则可也,然吾岂若是而无志者耶?姑以戚戚为无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会主上方以宽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贬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为天子尚书郎,谋画无所陈,而群比以为名,蒙耻遇僇,以待不测之诛。苟人尔,有不汗栗危厉惴惴然者哉!吾尝静处以思,独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于圣朝,下无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几似续之不废。是以僥荡其心,倡佯其形,茫乎若升高以望,溃乎若乘海而无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诚以浩浩而贺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长歌之哀,过乎恸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忽有“贺者”自京师而来,给他以吊慰,于是,他有了对人一吐抑郁的机会。“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长歌之哀,过乎恸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为何‘裂眦’、‘恸哭’?一言以蔽之:因为愤悱难抑。

与虚实相济式的对谈泄愤相比,在对话中指桑骂槐似乎更能宣泄不平,更易起到解气平愤的作用,如他笔下与“溪上聚鸢老壮齿,十有一人”对话,即是如此:

今先生来吾州亦十年,足挟疾风,鼻知膻香,腹溢儒书,口盈宪章,包今统古,进退齐良,然而一度不复,曾不若蹙足涎颡之犹有遭也。朽人不识,敢以其惑,愿质之先生。”先生笑且答曰:“叟过矣!彼之病,病乎足与颡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无耳。今朝廷泊四方,豪杰林立,谋猷川行,群谈角智,列坐争英,披华发辉,挥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驰声,卬角羈贯,排颡鳞征,一位新缺,百事交并,群倚县足,曾不得逞,不若是州之多髡师士马也,而吾以德病代

焉,岂蹙足涎颡之可望哉?叟之言过昭昭矣,无重吾罪!^[1](卷十五《起废答》)

不论就话语的本身,还是透过其表面去体会背后的深意,都能发现言说者内心悲愤难抑的情绪是何其沉重。选择在对话中宣泄如此不平的情绪,又不给人以太突兀的感觉,这应是柳宗元的高明所在。

《瓶》、《牛》二赋“其辞皆有所托”。因谪而愤,“感愤而作”,所作皆有所托,这说明,贬谪中的柳宗元悲愤难抑,托物泻愤成了他不可或缺的需要。因此,他就无时无刻不在试图找到一个舒泻郁愤的口子。这样做的难度可想而知,相反的,有时却又会因激而增愤,而且愤怒得无可遏止,《囚山赋》就是激愤难抑的佐证。赋曰:

楚越之郊环万山兮,势腾踊夫波涛。纷对回合仰伏以离迥兮,若重墉之相褒。争生角逐上轶旁出兮,其下坼裂而为壕。欣下颡以就顺兮,曾不亩平而又高。沓云雨而渍厚土兮,蒸郁勃其腥臊。阳不舒以拥隔兮,群阴沍而为曹。侧耕危获苟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劳。攢林麓以为丛棘兮,虎豹咆⁷阒代狴牢之吠噪。胡井管以管视兮,穷坎险其焉逃。顾幽昧之罪加兮,虽圣犹病夫嗷嗷。匪咒吾为桎兮,匪豕吾为牢。积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圣日以理兮,贤日以进,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

柳集《补注》引用宋人晁补之的评论说:“《语》云,仁者乐山。自昔达人,有以朝市为樊笼者矣,未闻以山林为樊笼也。宗元谪南海久,厌山不可得而出,怀朝市不可得而复,丘壑草木之可爱者,皆陷阱也,故赋《囚山》。淮南小山之辞,亦言山中不可以久留,以谓贤人远伏,非所宜尔,何至以幽独为狴牢,不可一日居哉?”^[1](第 63 页)晁补之《囚山赋》序,可谓不知人亦不知文。首先,所谓的“仁者乐山”,以及“达人”“以朝市为樊笼”,都必须有一个前提,即“仁者”或“达人”要主动离朝市而亲近山林。其次,对一般人而言,接近或达到“仁者”、“达人”的境界也有一个过程,柳宗元初贬柳州时是否就已经达到了“仁者”、“达人”的境界,尚存在很大的疑问。从人生追求来看,柳宗元是那样的执著于俗世的事业,可谓到了九死不悔的程度,在“山林”与“朝市”之间,他更钟情的无疑是后者。对着那一望无尽面目狰狞的大山,他吼出了愤极之语:“圣日以理兮,贤日以进,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

三

愤懑的情绪充满内心,柳宗元却并非一任决堤四溢。这样说的原因在于,其一,在长达十年的永州放逐生涯中,柳宗元迎来了诗文创作的高峰期;其二,在诗文创作之外,他还潜心撰写了许多“见解独到,笔锋犀利,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的哲学、历史论著^[6](第 28 页)。这两点足以说明,首先,柳宗元的情绪没有失控,愤怒的潮水没有溢出理性的堤岸,而是以另一种形式转化成了诗文创作的激情。其次,诗文创作如果说也是一种抑郁情怀的宣泄的话,那么,哲学、历史论著的写作就应该是一种细密、审慎心境下的精神产物,它更需要冷静、沉潜,而不是躁动、愤激。检视柳宗元贬谪期间的作品,尤其是那些“意在愤世嫉邪”的赋类作品,完全能够看得出来,他对愤排之情难能可贵的节制,以及在艰难困苦的人生绝境中不甘沦落奋发进取的智性作为。

在贬谪困境中,深得骚学之旨的柳宗元,对这类文体情有独钟。首先,他较多地采用了骚体赋来抒发满怀郁闷;其次,即使是写作诗文,他也常在这样的作品中抒写只有骚类文体才惯常抒发的郁怨愤悱情怀。柳宗元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他看重骚类文体独具的抒情性特征,以及他对这种特征的深层体味与把握;另一方面,柳宗元的遭遇与绝大多数骚类作品中的抒情主体——迁客骚人极为相似,这类作品使得他把现实与历史、虚拟与真实、自我与他人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更便于倾情尽兴地宣泄难抑的愤懑。作为一个逐客,柳宗元选择一种最适于自己抒写情怀的文体样式时,基于先天赋就的禀性,以及后天养成的心理,他更容易想到的是“知不可而愈进兮,誓不偷以自好”的忠臣萑弘,是“有功而不见知,而以谗废”的乐毅。当然,“无罪被贬的诗人自然而然地会想起千年以前‘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在此写下大量怨悱之作的屈原。相似的遭遇,使他与屈原获得了思想上的深层共鸣,地域的巧合,则使他对

屈原的生存状态感同身受;时间上的悬隔,更使他蓦然生出“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无限悲怆。^[9](第75页)于是,他才能“放情咏《离骚》”,进而写下《骂尸虫》、《憎王孙》、《宥蝮蛇文》诸文。

在《宥蝮蛇文》中,柳宗元竟对“贼害无辜”的毒蛇大发怜悯之心。这里的蝮蛇,实际上就是柳宗元的现实遭遇中的“小人谗佞之类”。柳宗元对蝮蛇的怜悯,反映出他的另一种意识倾向,即在某种情况下,他用宽容之心去对待陷自己于艰难苦恨的仇敌。其中透露出的信息不外是,柳宗元的愤激之情在某些时候已经有所收缩内敛。出现这种情况,最直接的原因是,剧烈的愤悱浪潮激荡之后,他的内心世界趋于相对的宁静。于是,他才能拥有一种宽容的情怀。与怜悯蝮蛇相同其趣的是,他赞赏“君子”獬的做法,即不去追究“小人”王孙的恶劣行径。在柳宗元的眼里,獬与王孙善恶不同,泾渭分明。獬与王孙交锋的结果是,“獬弃去,终不与抗”。由于柳宗元本身的不幸遭遇,人们自然会把文中的獬与王孙跟现实中的人事挂起钩来,所以才有人说:“子厚《憎王孙文》以獬喻君子,王孙喻小人,有意乎用君子而去小人也。”^[1](第500页)但是,他“恨”的并不是王孙,而是与王孙德性相同的现实世界里的人。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即柳宗元接连发出的追问:“噫,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噫,山之灵兮,胡逸而居?”就柳宗元的处境、心境而言,他满腹怨愤欲得倾吐为快,一任愤怒尽情发泄才更符合他此时的情性。但这里的柳宗元却问得软弱无力,甚至有点祈求于“山之灵”的味道,这就表明,他的愤悱,以及宣泄愤悱之情的方式,也在因时因地发生变化。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柳宗元的另一篇文章《骂尸虫文并序》,摘引如下:

……柳子特不信,曰:“吾闻聪明正直者为神。帝,神之尤者,其为聪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阴秽小虫,纵其狙诡,延其变诈,以害于物,而又悦之以饗?其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虫若果为是,则帝必将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其类,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虐不作,然后为帝也。”余既处卑下,不得质之于帝,而嫉斯虫之说,为文而骂之:

来,尸虫!汝曷不自形其形?阴幽跪侧而寓乎人,以贼厥灵。膏肓是处兮,不择秽卑;潜窥默听兮,导人为非;冥持札牒兮,摇动祸机;卑陋拳缩兮,宅体险微。以曲为形,以邪为质;以仁为凶。以僭为吉;以淫谀谄诬为族类,以中正和平为罪疾;以通行直遂为颠蹶,以逆施反鬬为安佚。谮下谰上,恒其心术,妒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窃出,走谗于帝,遽入自屈。默然无声,其意乃毕。求味已口,胡人之恤!彼修蛭恙心,短蛭穴胃,外搜疥痒,下索痿痺,侵入肌肤,为己得味。世皆祸之,则惟汝类。良医刮杀,聚毒攻饵。旋死无余,乃行正气。汝虽巧能,未必为利。帝之聪明,宜好正直,宁悬嘉饗,答汝谗愿?叱付九关,貽虎豹食。下民舞蹈,荷帝之力。是则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灭汝之精。蓐收震怒,将敕雷霆,击汝丰都,糜烂纵横。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群邪殄夷,大道显明,害气永革,厚人之生,岂不圣且神欤!

祝曰:……惟帝之功,以受景福。……惟帝之德,万福来符。

柳宗元的想法十分明确,对王孙的愤恨要祈求“山之灵”,同样,愤恨尸虫的时候又想到:“荷帝之力”,“俟帝之命”,“惟帝之功,以受景福”,“惟帝之德,万福来符”。当他这样的想法付诸行动时,极有可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一方面,他的愤悱之情会因此失去磅礴的气势,甚至渐归消歇;另一方面,他自身也会逐渐产生一种倾向,即更加趋向于自我反省,而反省需要的内敛又逐渐代替了愤悱需要的外向张扬。弃逐困境中的柳宗元,一度愤山、愤水、愤万物,如前所述,归根到底怨愤的是人。是什么人呢?他曾这样说:“然有可恨者,人或权褒贬黜陟为天子求士者,皆学于圣人之道,皆又以仁义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辞窥貌,逐其声而覈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瞽祸贼僻邪,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多清明冲淳不为害者。彼非无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犹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于此者。”^[1](第466页)显然,他深为愤恨的是这种人,或者说是与这种人性性质相同的所有人。智者如柳宗元,他怎能不明白这样的道理:所有这些他愤恨的人,不都是受节制于人间的“灵”与“帝”的吗?于是,在愤悱排发的同时,他也开始酝酿着弃逐逆境中心路历程的第二个阶段——自省与超越。

[参 考 文 献]

- [1] 柳宗元. 柳宗元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2] 刘 昫等. 宪宗纪[A]. 旧唐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3] [美] W·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M]. 单德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 [4]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5] 欧阳修, 宋 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6] 尚永亮. 柳宗元诗文选评[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责任编辑 何坤翁)

Resentment and Burst-out in the Exile Situation

WANG Chengd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WANG Chengdan (1965-), male,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Schoo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bstract: When LIU Zongyuan fell into the adversity of banishment, his mental tendency was mainly occupied by the resentment, that generated from under the condition of being banished without any criminal behaviour but doing a lot of good deeds, and also the sufferings caused by physical and mental torture. Although he resentfully treated everything he met, he actually concentrated on the people and the “gods” as well as the “emperor”. And uptill then, LIU’s resentment commenced to change fundamentally.

Key words: LIU Zongyuan; adversity in banishment; resentment; burst-out